

# 以德共意：乡村政治沟通行为的合理化研究

## ——以“硬核”喊话为例

徐明华，桑超凡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政府与民众之间积极合理的沟通是有效应对疫情危机、实现乡村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观点，对“硬核”喊话的沟通实践进行主题提取和积极话语分析后发现：在“硬核”喊话的话语互动中，政府和公众因面临相同的社会风险现实，更能团结情感与他人共享意义，实现了政治沟通方式的和解与价值目标的一致。其中，社交媒体的“再语境化”重构了乡村政治沟通的场域，原有的范围治理边界和部落化威权意义被消解，基层管理者情感的主动公开引发了大众情感的共鸣，“家国同构”和“家国一体”的道德规范意识成为中国乡村政治沟通合理化的核心要义。

**关键词：**政治沟通；交往行为；合理化；共同体；道德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2) 05-0011-09

## 一、研究缘起

在疫情应急管理措施的推行过程中，积极合理的政治沟通是促进政策落地的关键一步。就乡村社会而言，春节期间返乡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扩大了疫情的输入性风险，加之农村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相对较低<sup>①</sup>，居家隔离等应急措施的推行存在较大压力，如何有效动员广大群众，凝聚散落的社会共识成为乡村抗疫治理中的难题。广播作为可以将党和国家的声音传达到田间地头的治理手段，<sup>[1]</sup>是动员和整合乡土社会的重要创造。但从政治沟通的公共性角度出发，村干部喊话的传播效果常被归结为话语背后的权力因素，其残留的威权符号意义是一直需要反思的问题。<sup>[2]</sup>出人意料的是，此次疫情期间的广播喊话不仅没有因为其声音权力的优势引发乡村和社会的反感情绪，反而促成了公众的情感共鸣，“硬核”成为建构共识的政治沟通方式。据云和数据显示，以“天津广播 你别太自信了”“河南村长”为代表的多个乡村广播喊话的案例成为新浪微博的热搜话题，当日搜索量均超过390余万次。特别是河南省辉县市占城镇大占城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平的方言广播，因使用愤怒的语气提醒村民不准外出聚集，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河南村长”更泛化为负责任管理者的隐喻。是什么导致“硬核”喊话成为中国乡村政治沟通的合理化方式？如何从民众响应与政府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寻找乡村政治传播实践的合理化路径？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

## 二、文献回顾

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与政治学家卡尔·沃尔夫冈·多伊奇（Karl Wolfgang Deutsch）发表著

**基金项目：**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评价体系数据库建设研究”（2021ZLXJ005）。

**作者简介：**徐明华，女，教授，博士生导师；桑超凡，男，硕士研究生。

<sup>①</sup>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披露的数据，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素养为20.02%，较2019年增长4.3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城市居民。

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政治沟通理论宣告正式诞生。受到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控制论的影响，以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等为代表的早期的政治沟通分析倾向于从系统和社会的宏大视野，还原传播对于整个政治系统有效运行及其合理化的意义，将信息的有效接受和处理视作政治系统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sup>[3]</sup> 但伴随着对政治主体不同程度的关注，学界关于政治沟通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围绕政治家及利益团体开展的政治宣传、政治说服、政治营销等方面的研究，即传统的控制分析路径；二是从底层社会视角出发，从社会舆论、社会抗争、公共领域的形成上，讨论公众这一主体的政治沟通行为和表征，即反支配分析路径。

### （一）控制分析路径：以政治家为主体的政治宣传与政治营销

控制分析路径认为，政治沟通是以政治家为核心的信息“输入—输出”活动，政治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和管理。受二战中宣传战及现代西方竞选政治实践的影响，以政府为主体的政治沟通研究成为显学。政治沟通研究被演绎为政治宣传、民意引导、政治演说、竞选言行、意识形态、政治心理等，<sup>[4]</sup> 大众媒介被视作政府及其代理人控制引导民众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对于西方政治家而言，政治沟通被具化为民调、竞选、演说等政治行为，也被具化为借助大众媒介推行政策措施、操纵公众舆论的政治活动。从尼克松时期的竞选类的电视广告放送，到卡特时期的商业民调推行，到里根时期的视觉品牌塑造，到克林顿时期“作战室”的使用，再到奥巴马、特朗普时期的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技术的引入，美国的历任总统及其政治团队都能够以清晰的信息和敏锐的焦点，在媒体平台上展示个人形象和执政理念，使其传递的信息与预期受众相匹配。<sup>[5]</sup> 作为现代治理术的一部分，以政治家为主体的政治宣传，通过精心设计的信息操纵和控制行为已经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sup>[6]</sup>

但政治宣传效果的不确定性促使以政府为主体的政治沟通不断调整宣传观念和话语策略。特别是随着现代广告和公共关系带来的营销革命，单向的政治宣传开始向强调双向沟通和品牌传播的政治营销转变。尽管政治营销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西方政治语境和社会背景，但政治营销理论的形象营销和危机营销等范式，也能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研究提供成熟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sup>[7]</sup> 我国学者赵可金、孙鸿将政治营销视作“特定政治行为主体运用有效的营销手段与众多社会行为体进行信息沟通、理念交流和产品服务交换，以获取民众认同和合法性支持，最终改变社会行为体的行为进而实现其政治目标并取得政治权力或权利的活动、形式、关系和过程”<sup>[8]</sup>，这一定义突出了政治生活中多主体的互动，虽然精巧隐蔽的技巧不能掩盖其维护政治家主体利益的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从关系的视角理解政治家的传播行为提供了可能。

### （二）反支配分析路径：以公众为主体的公共舆论与社会抗争

政治沟通的主体通常涉及政府与公众两方，但二者在学术中所受到的关注却大不相同。<sup>[9]</sup> 反支配分析路径从话语权和话语资源相对弱勢的公众视角出发，认为政治沟通是以公共舆论为核心的传播活动，是一种对权力组织和政治活动家的制约力量。<sup>[10]</sup> 虽然公共舆论研究可以被划分为心理说、意见说、修辞说、行为说、信念说等各种不同的范式和取向，但抽象的、理性的、整体的、先验的公共利益观却是所有研究不可缺失的前提和基础。<sup>[11]</sup> 因此，当公众作为公共舆论的主体参与政治沟通时，就成为一种与把持信息传播的操纵者相冲突<sup>[12]</sup> 的反支配力量。特别是在违规违法、渎职失职、徇私舞弊、贪污腐败等权力监督议题上，以公众为核心的公共舆论具有更加明显的反支配色彩。<sup>[13]</sup> 而持续的、集体的、以民众利益为基础诉求的公共舆论就逐渐演变为社会抗争的重要表征和行为机制。<sup>[14]</sup>

社会抗争是政治沟通研究的重要传统，带有明显的反霸权逻辑：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公众通过公共舆论和集体行动等形式，要求政府以主要或第三方角色介入其中，推进社会事件的解决和反支配方

案的实施。<sup>[15]</sup> 基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实践, 既有研究不仅在环境议题、法制议题、文化议题、性别议题上丰富了社会抗争的内涵, 更发掘了视觉抗争、符号抗争、身体抗争等多种“以媒抗争”<sup>[16]</sup> 的社会抗争分析形式。传统观点和实践经验都表明, 社会抗争作为一种政治沟通实践具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颠覆性。但很多学者也发现, 中国互联网语境下的社会抗争实际上促进了政治沟通进程, 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安全阀”(safety valve) 的效能。<sup>[17]</sup> 因此, 如果将政府与公众视为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对立关系, 而非公共空间的对话、互动与协商关系,<sup>[18]</sup> 这将不利于政治沟通公共性价值的发挥, 也窄化了从公众角度出发的政治沟通研究范围。

### (三) 政治沟通分析新路径: 互动关系下的交往行为与合理化

无论是控制路径还是反支配路径分析, 政治沟通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聚焦政治沟通的不同主体并不能掩盖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 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形式(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或是利益动员) 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sup>[19]</sup> 的这一事实。因此, 无论是从政治系统的运行还是公共价值的维护出发, 政治沟通体现的都是一种对话协商的政治互动关系, 是不同主体间的交往行为。<sup>[20]</sup>

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将交往行为定义为“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 这些主体使用口头的或口头之外的手段, 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 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sup>[21]</sup>, 与目的性/策略性、规范性、戏剧性行为不同, 交往行为突出的是“互动”“关系”“对话”这样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视角下的政治沟通是一种政府和公众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 这种互动以语言为媒介, 通过具体的行为语境寻求“对话”, 达到相互理解和价值目标的一致, 实现合理化的交往。<sup>[22]</sup> 基于此, 我国学者提出政治沟通“日常化”的观点, 重视日常生活表达与公共领域对话的某种动态交往过程,<sup>[23]</sup> 正是基于这种具体的语境, 才能反思政治沟通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的关联, 追求其合理化和有效性, 实现社会发展和进化。

纵观已有“硬核”喊话研究: 聚焦于科学传播策略的讨论集中表现在对农村社会中主客体典型关系的探讨,<sup>[24]</sup> 是一种目的性行为的研究视角, 与“客观世界”相关联; 探寻“硬核”喊话背后的社会法治逻辑偏向于明确乡村社会的规范调节,<sup>[25]</sup> 与“主观世界”相联系; 还原农村大喇叭的传播过程则凸出了这一媒介在疫情风险预警中的传播效果,<sup>[26]</sup> 与“社会世界”相关联。可以发现, 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只是部分把握了“硬核”喊话在政治沟通行为中的功能, 而只有在交往行为视角下, 政府和公众主体之间的话语实践才能被视为协调意见的基本机制, “硬核”喊话的政治沟通行为才具有合理化意义。由此, 本研究选择全面关联到上述三个世界的“交往行为”视角, 将话语的相互理解功能视为意识、心理和思想上协调政治沟通行为的基本机制, 考虑话语的各个向度, 从公众主体的响应性以及可证实性的道德实践方面探寻“硬核”喊话的合理化机制。<sup>[27]</sup>

##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的“河南省辉县市占城镇大占城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平硬核喊话”作为研究案例。“硬核”喊话案例中的政治沟通过程包括: 村干部喊话的行为、村干部喊话作为背景事件引发的网民讨论以及上述两者对整个乡村政治传播和政治文明的影响。因此, 对于“硬核”喊话案例中交往行为和互动关系的分析既包括对评论文本在语义主题上的提取, 还包括对话语实践所处政治传播和社会语境的考察。

首先, 评论文本是网民与“硬核”喊话这一背景事件互动后的结果, 从文本主题的提炼入手, 有助于还原公众主体对这种乡村政治沟通方式的响应情况。目前在自然语言处理分析上比较成熟的潜在

狄利克雷分布法（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简称 LDA），可以通过无监督计算的方式实现对文本隐含主题的提取和聚类，最终隐藏的主题将呈现为一个包含同类词集的词汇集，<sup>[28]</sup> 通过词集还原语义可以揭示表达主体的思维类型和目的旨趣。

其次，政治沟通任意主体的话语都是一种社会过程，不可避免地受社会其他要素的制约。因此只有结合话语实践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文本—语境”的互构出发，才能论证“硬核”喊话作为乡村政治沟通的合理性，从而为乡村政治实践提供道德意义上的参考。因此，在话语分析方法的选择上，本研究尝试在主题提取的基础上，借助詹姆斯·R·马丁（James. R. Martin）提出的“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 PDA）方法，从村干部和村民、村干部和网民之间的互动出发，遵循语篇分析描述，社会实践阐释，社会文化解释的分析模式和路径，<sup>[29]</sup> 寻求政治沟通所一直追求的“和解”（reconciliation）和“一致”（alignment）目标。

本研究将“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sup>①</sup> 的视频作为评论文本的抓取来源。最终，本研究采集到三条视频下共计 342551 条评论文本，去除其他网民对某单一评论的点赞，实际可抓取的评论文本数量为 21501 条。通过对该数据集进行去停用词、去除缺失值等清洗过滤后，本研究最终得到 18204 条评论文本作为有效的网民评论话语数据集（如表 1 所示）。

表 1 村干部的广播喊话所引发舆论的代表样本（数据截至 2022 年 3 月 1 日）

评论抓取来源平台	主体账号	评论总数	可抓取的评论数	处理后的评论数
抖音	新乡广播电视台	311921	1632	1352
新浪微博	梨视频	26033	17419	14576
Bilibili 视频网站	皓月-moonqshine	4597	2450	2276
合 计		342551	21501	18204

四、研究发现

（一）“硬核”喊话的产生：乡村治理视域下的个体行为

1. 强烈态度的来源：疫情防控工作的高度介入

在乡村社会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行中，村干部一方面需要承受上级政府累积的行政压力，另一方面，村干部作为村民自治的权力代表，与村民的关系确实存在一种“家长式”的微妙。因此，村干部和村民的沟通之间就存在一些现实困难。特别是此次“居家隔离”措施的推行过程中，有基层干部提到：“你们只看到硬核，没有看到背后我们到底有多难，挨家挨户敲门问有没有人发烧发热，居民看到我们跟看到瘟神一样赶我们。”河南村长也提到：“再三地强调，叫你搁家待着，你就待不住……疫情已极其严重，极其严重。你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是不是？把说的话当耳旁风。”

梁漱溟曾在《北游所见纪略》一文中用“铁钩”和“豆腐”的比喻来描述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困境：“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sup>[30]</sup> 尽管这样的比喻有其特殊的时代历史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乡村治理和基层政治沟通的困境。正如大占城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此前已通过多方宣传，告知村民疫情的严重性，但发现不少村民仍上街聚集。”<sup>[31]</sup> 基于这样的“劳而无功”现状，村干部只能调动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从疫情带来的现实风险出发，直言部分村民的越轨行为。村干部通过广播喊话，表达自身对于疫情期

① 目前关于信息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的具体数值尚未形成共识，本研究借助现在行政上通行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范围作为数据抓取的标准。



间外出聚集行为的强烈反对，其高度介入乡村社会管理的“保护型经纪人”角色充分显露。

2. 公开愤怒的缘由：乡村共同体利益的呼唤

当面对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的危急时刻，个人都会产生某种积极的或消极的情绪，神经科学的相关结果已证明这些反应属于个人应对未知的正常生理现象，但有趣的是将这些情感转化为某种行动或制度安排的机制。“硬核”喊话中，村干部公开个人的愤懑情绪，与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的利益维护密切相关。例如，强调不准外出是出于整体安全的考虑，是在响应“党支部村委会的号召”。再如，转换主体视角强化共同体情感：“你不怕传染别人还怕传染嘞。有些人，我简直没法形容你。长得那灰头土脸那样儿吧，你去那大街上鬼混啥嘞你？露你长了可好看？还是露你可了苗条？你看我多不怕死？”

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将情感铭刻在政治中，掌握话语权的群体情感经常是不透明的，除非是在受到内部或外部力量的影响下才会显露出来。<sup>[32]</sup> 若没有疫情带来的外部环境风险和乡村共同体内部结构的失衡威胁，村干部的情感可以处于一种休眠状态。当村干部选择公开和透明地表达情感时，其叙事的表征和意义已经在个体认知的基础上扩展到整个乡村社会的共同体中。

(二) “硬核”喊话的反馈：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公众参与

评论作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大众对于村干部“硬核”喊话的反映，对于评价这一政治沟通方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借助较为成熟的潜在狄利克雷分布法（LDA），可以实现对海量文本的主题萃取，有助于将散落的观点实现结构化聚类。结果显示，网民对于村干部“硬核”喊话的评论集中于 5 个核心主题，提炼出每个主题独有且概率值位于前 20 的关键词作为该主题的聚簇描述词（如表 2 所示）。

表 2 网民评论的每个主题及其前 20 位描述词

主题	与主题相关且独有关键词（top20）
Topic1	口罩、循环、播放、小区、打麻将、天天、串门、我爸、恨不得、聊天 亲戚、隔离、举报、街上、聚集、封村、坐标、拜年、大街、回家
Topic2	责任心、作业、惦记、觉悟、市长、操碎了心、湖北、实事、多好、认真负责 辛苦、父母官、控制、百姓、提拔、责任感、升职、好羡慕、推广、社会
Topic3	不重、理解、漂亮、24 小时、基层工作、接地气、客气、粗暴、做得好、简单 管用、口吐芬芳、重点、方式、态度、痛处、有时候、讲道理、人才、硬气
Topic4	理不糙、话糙、快乐源泉、太棒了、在线、句句、支援、鼓掌、舒服、太给力 同款、xswl、好多遍、请问、666、麻袋、尽职尽责、偷个、点赞、说得对
Topic5	班主任、优美、辉县、转发、方言、亲切、高中、学生、老师、教导 想起、动听、字幕、骄傲、好笑、学会、好看、红啞啞、白啞啞、翻译

从主题聚类结果可以发现：Topic1 主要涉及网民对于疫情防控措施的自我体会与反馈。借助“硬核”喊话提供的事件背景和契机，网民表达了“同为”“同在”“同命运”的社会现实，以循环播放广播宣传抗疫知识、设置关卡加强疫情防控等举措成为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社会经验。Topic2 是网民对于“硬核”喊话村干部负责任态度的认可和推崇。多次强调外出聚集风险，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是网民拥护基层管理者的主要原因，“操碎了心”的“父母官”成为疫情下所有管理者的榜样，“河南村长”成为具有“标准化”意义的社会符号。Topic3 呈现出网民对于村干部喊话“硬核”方式的理解和接纳。虽然在“硬核”喊话中有不少粗俗甚至责骂的表达，显得这样的沟通方式有些“简单”“粗暴”，但网民也有理解此种“硬核”方式的理由：一是对于基层疫情防控工作艰难程度的理解；二是认为方式虽然粗暴但是出发点更重要。Topic4 表现出网民对于这种“喊话”的单纯消费与娱乐化倾向。“快乐源泉”“xswl”（“笑死我了”的网络用语）、“666”“同款”等描述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网民对“硬核”

喊话的解读已经脱离了严肃的事实语境，带有一定的娱乐和消遣色彩。Topic5 则是网民类似社会记忆的唤起和对喊话中方言的戏仿。“硬核”喊话的政治沟通方式唤醒了网民对于相似宣教事件和人物的记忆，例如学生与班主任的对话。此外，通过对“硬核”喊话中的邯新片方言<sup>①</sup>的戏仿，网民表达了对方言这一乡村政治沟通媒介的喜爱。

（三）“硬核”喊话的互动：话语组篇中的共同体意识

积极话语分析关注政治性强、涉及社会重大问题的语篇，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宽松的社会。“硬核”喊话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乡村政治沟通行为，其目的并不停留在对个别不良行为的揭露与批判之上，而在于达成携手共抗疫情的社会共识。原始语篇的分析和评论主题的聚类虽然解释了话语的意义，但对政治沟通所追求的“和解”与“一致”目标的理解需要到话语互动产生的组篇意义中寻找答案（如表 3 所示）。

表 3 “硬核”喊话的话语互动阐释

组篇意义	主题线索	典型描述词
社会现实一致的“风险共同体”	Topic1	口罩、循环、播放、隔离、封村
价值目标一致的“情感共同体”	Topic2	责任心、操碎了心、实事、多好、辛苦
	Topic3	不重、理解、漂亮、做得好、管用
沟通方式和解的“话语共同体”	Topic4	太棒了、鼓掌、太给力、好多遍、点赞
	Topic5	方言、亲切、动听、好笑、学会

首先，新冠疫情背景下政府和公众组成“风险共同体”，面临着一致的社会现实。疫情的散点式和聚集性暴发逐渐普遍化，伴随着春节人员流动，乡村终结“未卷入”状态，疫情防控工作面临较大的压力，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但伴随着全社会个体的深度卷入（例如戴口罩、隔离、封村等），风险下的“痛苦”遭遇会客观地趋于一致。在风险之痛的“帷幕”下，为阻止进一步的危害，政府管理者和公众主体之间的共通性开始形成，而这一“风险共同体”包含了一种足以冲破地理边界的团结民主式的发展动力。

其次，基于抗击疫情的一致目标，管理者和公众组建了暂时意义的“情感共同体”。情感本身在人类个体间具有先在的共有性基础，以其作为介质的沟通得以避免因个体认知结构差异产生的偏差性解码。<sup>[33]</sup>无论是在乡村社会还是在网络社区，“硬核”喊话的目的性正义淹没了其手段的简单直接，急民所急的责任心与基层工作的辛苦得到广泛的认可。公众得以从现实经验层面，根据自身的经历过的各种情感体验，对村干部的愤怒进行“移情”，以自我情感体验“带入式”地对村干部的情感表达进行阐释与解码，以“共抗疫情”的团结情感与他人共享意义、实现沟通互动。

最后，社交媒体重塑了“硬核”喊话的交往情景，实现文化意义上的“话语共同体”建构。特别是亚文化群体围绕“硬核”喊话的话语生产（例如“同款”“xswl”“偷个”“666”等），不仅消解了村干部喊话残存的威权意义，形成对主流文化和刻板印象的形态颠覆，而且“硬核”喊话在社交媒体中被人们分享、挪用和维系的同时，其自身内含的政治经验、政治观念也被分享者、挪用者、维系者重塑，形成一种与乡村部落看似相似却又大不一样的社交媒体政治语境，即一种社交媒体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功能。

五、结论与讨论

乡村政治沟通行为合理化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主体间的关系，即充分评估主体之间达成一致和相互

① 邯新片是晋语的八大片之一，以河北省邯郸市方言和河南省新乡市方言为代表。

理解的可能条件,从主体交往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关联中寻找其特征。研究发现:首先,此次疫情中“硬核”喊话合理化的前提在于政府和公众面临相同的社会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处于一个被社交媒体重构的新的“客观世界”中,全社会的深度卷入使得村干部的陈述更加真实。其次,“硬核”喊话合理化的过程在于公众对村干部的个人愤怒实现了共情,在二者互动的“主观世界”中情感治理手段成为衡量政治幸福感的标志。最后,“硬核”喊话合理化的核心在于村干部与大众之间在意识、心理和思想上实现了政治沟通方式的和解,“家国同构”和“家国一体”的道德规范意识成为乡村这一“社会世界”的共意。

### (一) 以小见大: 社交媒体介入重构乡村政治沟通场域

社交媒体的介入赋予“硬核”喊话这一“小”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沟通行为以广泛的社会意义,政治沟通场域也由原来的乡村社会扩展至整体社会。从乡村治理的在地化角度出发,村干部作为乡村共同体社会的“保护型经纪人”,通过广播喊话强调疫情期间外出聚集风险,维护的是全体村民的整体利益。但从危机治理的社会化意义上而言,借助“硬核”喊话提供的契机,网民话语不仅传递出“与你同在”的广泛社会现实,认可村干部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手段,还给予高度介入疫情防控工作的村干部最大程度的包容,对“硬核”方式表示理解和接纳。最终以风险共同体中“利益共感”的方式,赋予了“硬核”喊话在社会层面上的合理意义。

此外,类似“喊话”的单方向政治沟通是基层治理常用的手段之一,不可避免地带有“家长制”的威权色彩。但伴随着返乡群体的人员流动,社会化媒体以被动的姿态、以潜伏式的凸显方式进入乡村社会治理空间,<sup>[34]</sup>乡村小共同体内部的政治沟通行为演变为全体网民共同参与的媒介化背景事件。无论是对喊话中方言的戏仿,还是基于喊话内容的二次加工,网民对于“硬核”喊话的解读已经脱离了严肃的事实语境,其原生的“官民”符号意义也被扩大至“师生”这样的生活化场景之中,成为引发广泛社会记忆的原点。多元主体在交互的过程中将小共同体的沟通行为扩大化,打破了原有的范围治理边界和部落化的威权意义,重构了乡村政治沟通的场域。

### (二) 以情通理: 个体情感公开提升乡村政治沟通效力

政治家和管理者的言辞是培养集体情感的重要“场所”,他们用自己的身体、衣服和姿势等诸多介质实现对集体情感的引导。<sup>[35]</sup>特别是在深受儒家“情本哲学”影响的中国语境下,基层管理者的个体情感公开表达能够引发集体情感的共鸣。村干部广播喊话的“硬核”来源于对乡村社会共同体利益的维护,是面对外部环境风险的应激反应。特别是村干部公开表达的愤怒中,包含着对疫情走向的基本判断,包含着对外出聚集风险的重视,包含着对村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视。这种愤怒虽表现了乡村社会代理人对生活中重要事情的个人观点,但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或个人的价值观,而是一种追求全体村民安全和幸福的价值观,体现的是情感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从“硬核”喊话引发的网民讨论来看,即便在广播中表达愤怒有点“粗暴”,但有这样“操碎了心”的管理者,也成为政治幸福感的一种重要标志。

更重要的是,对村干部个人愤怒情感的解读影响着对基层情感治理手段的理解。学者玛丽·霍姆斯(Mary Holmes)主张从三个层面解读愤怒情绪:第一,抑制愤怒是文明人的表示;第二,压抑愤怒是有危险的,然而愤怒的方向必须是“无害的”;第三,愤怒的表达本身是好的,但必须高度管理。<sup>[36]</sup>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局的破解需要基层管理者充分调动其主动性,为了避免疫情防控工作推行的“劳而无功”,村干部选择直截了当地表达对越轨村民行为的愤怒,其目的和方向是“无害的”,而村干部在其“硬核”喊话中提到的“说这话不好听”“捅耳朵眼”在一定程度上完整了愤怒表达的高度管理逻辑,这也成为乡村政治沟通以情达意,以情通理的典型代表。

### （三）以德共意：家国逻辑建构乡村政治沟通合理化要义

政治沟通是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其合理化要义在于达成理解和共意（consensus）。哈贝马斯曾提出判断交往行为合理性的三个判断条件：一是交往行为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二是基于规范和价值建立关系的正确性（或适宜性），三是交往行为的意向和目的的真诚信。<sup>[27] (67)</sup> 因此，中国的乡村政治沟通合理化道路的实现需要使所有参与者围绕一个有效性的共识（包含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展开交往。在“硬核”喊话的实践中，村干部因为高度介入而选择公开个人的愤怒，意外地表达了意向的真诚信。而且与传统政治要求的理性话语规范相比，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感性的话语劝服实践。因此，这种“硬核”喊话的有效性基础是一种偶然性的预先设定。但从“硬核”喊话的话语互动结果可以发现，“硬核”喊话之所以成为乡村政治沟通行为的合理化方式在于其被嵌入到中国社会关于“道德”的约束性规范之中。

与西方使用自然法学说为道德世界和政治秩序奠定基础不同，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的特征是“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sup>[37]</sup>。“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成为理解中国政治道德价值观的核心隐喻，从亲亲到尊尊，只有维护好每个“小家”，国家这个“大家”才能繁荣昌盛。“硬核”喊话沟通行为的合理化要义在于，村干部对乡村共同体利益的维护已经唤醒大众对于社会共同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维护，社交媒体的再语境化促使“家国同构”和“家国一体”的道德规范意识演变为社会的共意，实现了沟通方式的和解，组建了文化政治意义上的“话语共同体”。

交往行为视角下的政治沟通强调主体间通过互动和对话达成合理性共识，这一主张在中国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语境中得到新的诠释。从本土社会情境出发，强调到交往互动的日常实践中寻找主体之间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期望，成为构建中国乡村现代化德治体系的关键思路。理想状态下，具有合理性的交往行为存在一个道德上自主的自我，进而主体之间的政治沟通过程会产生一个更加民主的共同体。<sup>[38]</sup> 以“硬核”喊话为代表的中国乡村政治沟通实践或许为实现这一“民主共同体”的理想提供了现实道路和发展可能。当然，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研究是语言性的、开放性的，如何从更加广泛的人际交往与关系网络中考察乡村政治沟通行为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潘祥辉. “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 70 年 [J]. 浙江学刊, 2019 (6): 4-13.
- [2] 彭兰. 我们需要建构什么样的公共信息传播? ——对新冠疫情期间新媒体传播的反思 [J]. 新闻界, 2020 (5): 36-43.
- [3] [美]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美] 小 G·宾厄姆·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M]. 曹沛霖, 郑世平, 公婷, 陈峰,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150.
- [4] 俞可平. 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61.
- [5] Newman, B. (2016). *The marketing revolution in politics: What recent U. 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can teach us about effective marketing*. Toronto: Rotma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6] 刘海龙. 宣传: 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 (第二版)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9: 210.
- [7] 彭姝. 政治营销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J]. 理论月刊, 2011 (1): 95-97.
- [8] 赵可金, 孙鸿. 政治营销学导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37.
- [9] 徐开彬, 杜忆竹. 从国家情感到个体利益: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作为一种政治沟通体裁的嬗变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 73-95+127.
- [10] 陈力丹. 关于舆论的基本理念 [J]. 新闻大学, 2012 (5): 6-11.
- [11] 郭小安. 舆论的公共性与公众性价值: 生成、偏向与融合——一项思想史的梳理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 (12): 53-66+127.



- [12] Savigny, H. (2002).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s*, 22 (1): 1-8.
- [13] 彭斌. 构建反支配的权力体系: 关于权力反腐败理念的新阐释 [J]. 政治学研究, 2020 (5): 16-26+125.
- [14] Tilly, C. (2004). Contentious choices. *Theory & Society*, 33 (3-4): 473-481.
- [15] [美] 查尔斯·蒂利, [美] 西德尼·塔罗. 抗争政治 [M]. 李义中,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9.
- [16] 白红义. 以媒抗争: 2009年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17 (11): 83-106.
- [17] Lorentzen, P. (2017). Designing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post-1989 China. *Modern China*, 43 (5): 1-35.
- [18] 郭小安. 新媒体环境下对舆论核心要素的再思考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 (6): 122-130.
- [19] [英] 戴维·米勒, [英] 韦农·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M]. 邓正来,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547.
- [20] 郁建兴, 何子英. 政治交往: 一种政治沟通的新分析路径 [J]. 社会科学辑刊, 2009 (4): 4-9.
- [21]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84.
- [22] 孟威. “合理化”的意义与实现——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述评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0 (2): 10-17+94-95.
- [23] 何震. 交往行为视角下政治沟通日常化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16 (7): 59-66.
- [24] 胡正强, 陆舒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农村“硬核喊话”传播现象解读 [J]. 新闻爱好者, 2020 (6): 20-23.
- [25] 崔玮.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 (3): 16-27.
- [26] 郭森, 郝静. 虚拟聚合与精准解码: 农村广播大喇叭在突发疫情传播中的政治功能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1 (2): 98-105.
- [27]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 [M]. 张博树,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122.
- [28] 金苗, 自国天然, 纪娇娇. 意义探索与意图查核——“一带一路”倡议五年来西方主流媒体报道 LDA 主题模型分析 [J]. 新闻大学, 2019 (5): 13-29+116-117.
- [29] 张德禄, 张珂. 多模态批评 (积极) 话语分析综合框架探索 [J]. 外语教学, 2022 (1): 1-8.
- [30] [美] 艾凯. 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M]. 王宗昱, 冀建中,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120-121.
- [31] 侯昂昊. 独家对话河南“喊话”村支书: 知道被上网后压力很大 [EB/OL]. <http://www.dahebao.cn/news/1487533?cid=1487533>.
- [32] Berezin, M. (2002). Secure states: Towards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emotio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0 (S2): 33-52.
- [33] 徐明华. 情感传播: 理论溯源与中国实践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138.
- [34] 李红艳, 韩芸. 以“一”贯之: 社会化媒体视野下乡村治理秩序的重构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3): 52-58.
- [35] Martha, C. (2013). *Nussbaum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36] Holmes, M. (2004).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ngry: Anger in political lif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7 (2): 123-132.
- [37]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 2015: 20.
- [38] [美]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对空言说: 传播的观念史 [M]. 邓建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32.

[责任编辑: 高辛凡]